

古代韓國的巫與日官

張寅成

目錄

- 1、序言
- 2、巫與日官的出現
- 3、巫與日官的差別
- 4、結論

1、序論

眾所周知，接受佛教以前，薩滿信仰已經成為古代韓國人的宗教信仰的深層結構。接受佛教以後，薩滿信仰喪失了支配政治社會的力量，但是仍舊在社會基層維持它們的堅韌的生命力，在許多方面與佛教互有影響。因此，古代韓國薩滿信仰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課題¹。

薩滿信仰是基於現實世界是與超自然世界有密切關係，提出人與社會運作的說明體系，薩滿擔當現實世界與超自然世界的交流的特徵。因此薩滿信仰反映現實世界，離不開社會文化的歷史條件，透過薩滿信仰可以探索古代韓國人的許多面貌²。

古代韓國神話雖然寫於高麗時代，然而透露古代韓國人的世界觀。古代韓國神話的內容主要包含古代國家的建國過程，幾乎沒有提到世界與人的創造過程。著名的檀君神話也是古朝鮮的建國神話，經過天與地的交流以及和諧而檀君誕生，描寫以檀君為君主的理想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檀君神話出現薩滿信仰的山（太白山），樹（神檀樹）。這些內容直接反映薩滿的世界觀。除了這些內容之外，古代韓國人的人生觀，靈魂觀，動物觀，神觀無不牽涉到薩滿信仰。

註一 最近，有關薩滿信仰的研究傾向與成果，可參考如下論著：

朴一永「解放後半世紀的韓國巫教研究史」（韓國宗教學會編《解放後五十年韓國宗教研究史》圖書出版窗，1997，頁187-218）；同書徐永大「韓國古代宗教史」221-293頁也介紹古代韓國薩滿信仰的研究成果。徐永大「韓國土著宗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國史論》28（1998），頁477-454；金聖禮「韓國巫教研究之歷史考察」（金聖禮外《韓國巫教研究之歷史考察》1999，頁139-207。

註二 徐永大「古代韓國之宗教職能者」《韓國古代史研究》16，羅希羅「古代韓國的薩滿信仰」《韓國古代史論叢》第九集2000，85-112頁；羅希羅「古代韓國的薩滿信仰的世界觀與佛教的理想世界」《韓國古代史研究》20（2000），頁197-233。

古代韓國薩滿的職事包括治病，預言，祭祀，占卜等。這些問題是已經研究得比較透徹，可以說是新資料發掘以前，無法提出新穎的見解。但是薩滿的社會影響力來源於不只是上面所提的職事，而是來源於社會知識與價值的維持與傳遞，以及權力的產生與維持。所以從這些角度可以重新研究薩滿的社會功能。

從前研究古代韓國薩滿的時候從歷史的角度探討得比較少，大概是因為有關薩滿的資料相當零散。因為比較研究容易突現某些特徵，所以我們可以採用比較研究。尤其是薩滿與日官是在古代歷史長時間互相競爭，³透過薩滿與日官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知道薩滿的職事，社會覺色，政治社會的影響力的變化。

2、巫與日官的出現

古代韓國的史書記載有關巫的史料，巫可以看做薩滿，所以利用有關巫的史料建構薩滿的歷史。新羅真骨貴族金大問是第一次說明巫的社會職事與地位。金大問是統一新羅成德王時代人，寫了【化朗世紀】等許多書。他重視歷史敘述的合理性與客觀性，但還強調綿延不斷的新羅傳統精神⁴。新羅第二代王是新羅始祖朴赫居世居西干的嫡長子，把王號稱之為南解次雄。金大問說明把王號稱為次雄的理由，如下：

次雄，或云慈充，金大問云【方言謂巫也，世人以巫事鬼神，尚祭祀，故畏敬之，遂稱尊長者為慈充。⁵

從金大問的說明可以知道新羅建國時期，巫的職事是事鬼神與尚祭祀，所以新羅人敬畏巫，巫的社會地位相當崇高。但是我們沒辦法知道巫的出現時期，職事的具體內容，巫與政治的關係。

巫是古代韓國的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在世界歷史上，薩滿譬仰已經出現於舊石器時代，法國的 Trois Freres 遺址壁畫充分表現舉行宗教儀式的宗教人物。韓國周圍的舊石器文化也有有關宗教人物的遺址。西伯利亞地區的 Irkut 附近的 Malta 遺址出土了女像，鳥，魚等。學者以為這些遺物は薩滿信仰的象徵符號。Malta 所出現的薩滿信仰的世界觀不僅見於中國，也見於瑪雅文明，薩滿信仰的世界觀是舊石器時代以來環太平洋地域的共同的文化因素。⁶

註三 辛鐘遠「古代之日官與巫 - 薩滿政治思想史的意義 - 」《國史館論叢》13 (1990)，頁 23-49；崔錫榮「關於巫與日官間干戈的歷史考察 - 三國時代 - 高麗時代巫的地位變化 - 」《比較民俗學》第十三集比較民俗學會，1996，頁 605-629。

註四 李基白「金大問與其史學」《韓國史學之方向》- 潮閣 1997 再版，頁 12-16；趙仁成「金大問之歷史敘述 - 以思想的背景為中心 - 」《韓國古代史研究》13 (1998)，頁 277-295。

最近中國新石器時代有關巫的考古資料逐漸累積，比如 1973 年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遺址的舞蹈紋彩陶盆，1982 年甘肅秦安縣五營鄉大地灣的圖像，1987 年輕河南濮陽西水坡的巫與龍虎鹿等圖像等就是。這些考古資料本身不能說明巫的存在，但是如果配合中國古代文獻與民族學資料來看，可以知道中國新石器時代巫的存在。⁷ 國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還不能夠充分證明薩滿信仰，但是韓國學者說明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宗教生活的時候，常常提及薩滿信仰的存在。李基白的【韓國史新論】強調新石器時代的薩滿信仰。

為了說明新石器時代薩滿信仰，他提到東三洞遺址的貝面，但有些考古學者懷疑東三洞遺址貝的具面的功能，現在從一個貝面不能說明新石器時代的薩滿信仰。而且李基白強調薩滿個仰是只是新石器時代的重要信仰，並沒有說明接受佛教以前的青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的宗教信仰。

紀元前 6 千年或紀視麗 8 千年到紀元前 1 前年的韓國新石器時代，薩滿信仰不僅發生，而是支配韓國思想界的宗教形態。雖然新石器時代的薩滿信仰研究要依賴後代的資料與現今的巫俗，但是我以為巫術信仰的研究一定要跟新石器時代的社會配合。⁸

韓國青銅器時代從紀元前十世紀左右開始。韓國青銅器時代是以無文陶器，磨製石器，支石墓，銅劍等青銅器，農耕的普及為特徵。⁹ 韓國初期青銅器文化是遼寧式銅劍文化，後期青銅器文化是韓國式銅劍文化。韓國式銅劍文化以韓國式銅劍，銅鉞、銅戈、多紐鏡、儀器為主要特徵。韓國式銅劍文化來自于中國東北地區的遼寧式銅劍文化，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韓半島內遼寧式銅劍文化與韓國銅劍文化的繼承關係。所以現在普遍認為韓國式銅劍文化也來自于遼中地區的遼寧式銅劍文化的變形。韓國式銅劍文化是從紀元前 4-3 世紀發展到紀元前後。¹⁰

這些以銅劍為者的青銅器有什麼功能？青銅器主要用予武器與儀器，用這些青銅器隨葬或祭祀的理由是因為青銅本身的色彩與聲音會提高儀式的效果。帶有銀色或黃金色的青銅放出神秘的光彩，青銅器的聲音是恰好擴大神秘感的最佳的器具。青銅器生產本身具有神秘的效果。做青銅器的過程恰似煉金術，變化的過程意味新的生命誕生。這樣的工作很像春耕秋收的農田的過程，所以青銅器比較適合於儀器。¹¹

韓國考古發掘的青銅器是大部份隨葬品。青銅器象征墓主人的權力，地位與身份尤其儀禮用的青銅器不但是祭祀神的用具，而且是與神交通的道具。¹² 這些特征也出現于韓國式青銅時代的各種青銅儀器。從各種青銅儀器的用途，形制與紋飾可以知道青銅儀器是薩滿使用的法器。

註一二 張光直《宗教祭祀與王權》華夏考古，1996 年 3 月，頁 106。

青銅儀器有防牌形銅器，農耕文青銅器 劍把形銅器，肩甲形銅器，圓形有文銅器，圓蓋形銅器，喇叭形銅器，八珠鈴，竿頭鈴，隻頭鈴，銅鐸等。青銅器的紋飾有人的手，鹿，十字日光文，狩獵紋，紋飾的內容是西餐伯利亞薩滿使用的法器上的圖像類似。青銅儀器有用繩子綁好的地方，巫舉行儀式的時候佩戴青銅儀器，提高他們的威力。

韓國式青銅時代與文獻上的馬韓的形成時期是一致的。馬韓的別邑舉行以蘇塗稱呼的特別的宗教儀式。

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懸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圖，而所行善惡有異。

國邑中有祭祀天神的天君，稱為蘇塗的別邑，立大木，懸鈴鼓，祭祀鬼神。蘇塗的祭儀，跟巫儀相似。樹木是與上天交流的通路，鈴鐺、銅鏡、鼓也是舉行巫儀的法器。因此，我們可以蘇塗的主祭者為巫。尤其是青銅儀器出土的地方是馬韓的中心勢力範圍，現在的忠南、全北地方。這些證明上述內容。但是青銅器時代，政治權力與宗教開始分離，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

雖然國邑有政治統帥即主帥，另外叫天君祭祀天神，由此可知祭祀與政治已經分離。但是，天君似並未從屬於政治統帥之主帥。這可從「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中看出。

在三韓社會中逐漸擴大勢力範圍的新羅與百濟，在擴張領土的同時，致力與建設中央集權之國家。這些國家特別受到了漢四郡的很大影響。在馬韓的諸多國家中，相對較位于北方的百濟很早便受到了帶方郡的影響。這可從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看出。與此同時，考古發掘亦可證明上述地區確曾受到漢四郡的影響。通過歸屬公元前 1 世紀左右的茶戶里遺址 1 號墓出土的筆與削刀，可知，漢字做為一種文字，已經在韓半島全境地全面擴展。茶戶里遺址中出土的筆、削刀等文房用品，中國貨幣，漆器等象征權威的隨葬品以及出現在印章、儀禮中的漢字，也在暗示著上層階級壟斷使用了文字。通過文字輸入中國文化中，可能也包含有關日者的知識。這是因為當時生活在漢樂浪郡中的漢人，具有很多有關日者的知識。

「後漢書」《循吏列傳》出現的關於王景的記錄，可充分地說明這一情況。王景樂浪郡出身，「少學易遂廣窺群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術玄基云。」由此可以推測樂浪郡中有很多熟悉天文術數之人。在受到樂浪影響最大的百濟，早在其始祖溫祚王本紀（公元前 18 年到公元 28 年）裡已經出現了關於日者的記錄。

3、巫與日官的差異

在三國時代，把巫，日者，日官的活耀的時期按照國家分開，可以看出三者的變化過程。

國家與期時的變化

新 羅	b a c ac c cc							
百 濟	bb a							
高句麗	a ab a a a							
國 家 時 期	1	2	3 世紀	6	7	8	9 世紀	

根據『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中的有關資料制成本表

a 巫（含巫覡、師巫、巫醫）

b 日者

c 日官

從上面的圖可知，4 世紀以後日者不出現，反而日官出現，巫在韓國古代一直出現。這個原因是日者的官僚化，就是從日者到日官的變化。

百濟的日者出現于始祖溫祚王 23 年與 43 年。25 年的史料如下：

25 年王宮井水暴溢，漢城人家馬生牛，一首二身，日者曰”井水暴溢者，大王勃興之兆也。牛一者二身者，大王並鄰國之應也。”王聞之喜，遂有并吞辰馬之心。

43 年九月鴻燕百餘集王宮，日者曰，鴻雁民之象也將有遠人來投者乎。冬十月南沃仇頗解等二十餘家，至斧壤納款，王納之，安置漢山之西。

由此可知，日者的預言都應驗。

漢代的歷史學家司馬遷非常重視日者的社會角色，在史記羅列日者列傳，根據索引，日者是卜筮占候時日的術數者。所以，日者是在社會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隨著百濟國家體制的確立，日者被編入官僚體系。根據周書百濟傳，泗泚時代的百濟有 22 部官僚機構。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網部、日官部、都市部。值得注意的是，日官部具有天文氣象與術數的角色。

巫、日者、日官角色的變化如下表：

病人之判斷	a							
對國家之助或預言	bb	a	aa		aa			
對天體現象之解釋		b			c	c	cc	
		b			c			
國 家 時 期	1	2	3 世紀	6	7	8	9 世紀	

根據『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中的有關資料制成本表

a 巫（含巫覡、師巫、巫醫）

b 日者

c 日官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知道：1 在三國時代，有關病因的問題，則由巫來擔當；2 有關天文的解釋則由日者或者日官擔當；3 有關國事的預言或助言，則由巫與日者、日官共同擔當。但是，統一新羅時期，日官的重要性越來越大，而巫的角色在史料上少見。這個原因可能與日官的官僚化有關。

4、結語

根據韓國考古資料，古代韓國巫的出現是西元前 10 世紀開始的青銅時代。尤其是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用途與西伯利亞巫的佩飾相似，可知巫舉行儀式時，佩帶青銅儀器，提高儀式的效果。青銅時代是文獻上的三韓時代，三韓之一，馬韓舉行以蘇塗稱呼的特別的宗教儀式。蘇塗的祭儀跟巫儀相似，樹木是與上天交流的通道，鈴鐺，銅鏡，鼓也是舉行巫儀式的法器。

但是西元前一世紀的時候，漢四郡影響到韓半島的諸國家，尤其是百濟深受漢四郡文化的影響。所以百濟始祖溫祚王時代（西元前夕 8-西元且 8）日者出現。日者逐漸被納入官僚體系，成為日官。日官的角色是解釋天文現象，國事的助言，但是巫的角色是始終提供病因的訊息與國事的助言。隨著古代國家的官僚化，儒家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且日官有深厚的知識背景。但是巫始終依靠口傳的傳統，很難適應時代的變化，逐漸成為社會邊緣的角色。